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学术研究系列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

辛亥革命与 近代中国社会变迁

朱英 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

学术研究系列

辛亥革命与 近代中国社会变迁

朱英 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武汉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朱英主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7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学术研究系列)

ISBN 978-7-5622-5041-8

I. ①辛… II. ①朱… III. ①辛亥革命—研究 ②社会变迁—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K257.07 ②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91513 号

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

主编:朱英◎

责任编辑:肖颖

责任校对:刘峥

封面设计:罗明波

编辑室:文字编辑室

电话:027-67867369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42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u 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章光琼

开本:640mm×960mm 1/16

印张:37.75

字数:575千字

版次:2011年7月第1版

印次: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定价:105.00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拨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总 序

章开沅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是辛亥百年。作为辛亥革命的研究者，我自然感慨万千。

首先想到的，就是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说的那段话：“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

过去有些论者，常常讥刺孙中山为空想主义者，其实大谬不然。他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时时事事都从实际出发。他不仅密切关注现实，还关注历史，更关注未来。他没有把西方现代化看作完美无缺的样板，更没有机械地照搬西方政治模式，而是在总结既往百年世界历史的基础上，对西方的先进文明有所选择“因袭”，更有所斟酌“规抚”，从而才完成新的“创获”——“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他历经千辛万苦，终于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百年锐于千载”是孙中山对于同盟会成立以前那一百年世界历史的精辟概括，其实这句话也可以形容同盟会成立以后这一百年的世界历史，因为20世纪的“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等，其变化的幅度之大，速度之快，更远远超越了19世纪那一百年。我很重视“百年锐于千载”这句话，认为只有透过这前后两个一百年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才能更为深切地理解辛亥革命。

我们钦佩孙中山，因为他在伦敦总结 19 世纪百年历史并思考人类文明走向时，并无任何具有实力的社团作为依托，主要是时代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督策使然。他在大英博物馆漫游书海，几乎是孑然一身，固守孤独。然而他并不寂寞，他的心与祖国、与受苦民众联结在一起，同时也与世界各地善良的同情者联结在一起。他把祖国命运放在世界命运中间认真思考，并且像耶稣背负十字架一样，心甘情愿地承担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沉重课题。

我们钦佩孙中山，还因为他在百年以前思考的问题、探索的思路以及追求中国现代化的各方面实践，都已经成为宝贵遗产，在此后百年的中国历史进程中或多或少产生影响。辛亥革命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它更是一个伟大的社会运动，并非起始于辛亥这一年，更非结束于辛亥这一年。像任何历史上发生过的社会运动一样，它有自己的前因，也有自己的后果，而前因与后果都有连续性与复杂性。我们不是辛亥革命的当事人，没有任何亲身的经历与见闻；但是作为后来者百年以后看辛亥，可能对当年的若干重大问题观察得更为客观、全面、深切，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探索其前因后果的连续性与复杂性，具有更多的方便条件。

因此，我们反思辛亥百年，应该在连续性与复杂性方面多下工夫，换言之，就是在时间与空间两方面作更大的扩展，以期形成长时段与多维度的整体考察。

仅以三民主义为例，就能引发许多新的思考。

首先是民族主义，过去的研究多半侧重于“排满”问题的实质探讨，而有意无意冷落了对“五族共和”的阐释。其实，在中华民族作为国族认同方面，辛亥那一代人不仅开创于初始，而且还在政治、制度、政策乃至文化诸层面有持续的探索性实践。应该承认，孙中山及其后继者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贡献，至少我们在中华民族作为国族的总体观念上与前人是一脉相承的。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增进民族平等、团结，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乃至促进少数民族内部社会革新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但是，在民族认同与民族团结方面仍然存在着若干问题，仍然需要从历史到现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总结。

作为历史遗产，辛亥革命也有负面的因素。为鼓动民众推翻清

王朝而狂热地鼓吹“排满”，显然对早已存在的大汉族主义或汉族中心主义有所助长，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对历史还是对现实的看法中这些经常会有意无意地显现。即以 20 世纪初期革命报刊极力制作宣扬的“黄帝文化”而言，至今我们一味“弘扬”而未能有所“扬弃”其汉族中心主义内涵。所以我自去年以来不断提倡“新黄帝观”，即给始祖文化符号以更具包容性的诠释，这样才能更为增进对中华民族作为统一国族的认同，可能也更符合孙中山“五族共和”的积极意蕴。

其次是民权主义，回顾过去百年，也会有许多新的认知与感受。辛亥革命使共和国从此深入人心，此话不错亦非虚，但这次革命也仅仅是开启了共和之门，迈出了走向共和的第一步。就以孙中山自己为例，他对“五权宪法”的创建寄予很高期望，曾经明确揭示：“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但是，对于这个理念懂之者不多，应之者甚少，连孙中山自己也还缺乏相关的架构设计。直到 1920 年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并就任非常大总统之后，孙中山才逐步把“五权宪法”从抽象理念形成完整的国家体制框架。概括起来，无非是：（1）以“权能分离”作为理论基础；（2）“五权分立”具体化，成为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政府的架构；（3）进一步确定县一级实行选举、复决、罢官、创制等直接民权，每县选代表一人，组成国民大会代表全国人民行使治权，并授权中央政府行使治权。他认为，如此既可防止议会专制，又可杜绝政府腐败；既可实现直接民权，又可实现“万能政府”，堪称民权主义的完美境界。

但是，“五权宪法”倡议以来，孙中山却未能在生前实施自己的方案；而国民党定都南京以后，所谓“五权分立”的推行也是举步维艰，其后逐步演变得荒腔走调，更非孙中山所能预料。应该说，“五权分立”的立意还是积极的，即为了防止西方议会、政党政治的弊端，将考试权从行政权中分出，监察权从立法权中分出，借以寻求更为完善的权力相互制衡。国民党内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服膺者也并非都是虚应故事，其中确实有些忠贞之士满心期望通过“五权宪法”的实施，把中国引向民主与法制的进步道路。但是，任何良好的民主政治设计，都改变不了国民党政府“党治”、“军治”、“独治”的严酷现实，“五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只能

流于虚有其表的形式。这种披着“五权宪法”外衣的威权统治，在1949年以后随着国民党的失败而转移到台湾。直到蒋介石死后，迫于内外形势的急速变化，蒋经国在临终前解除了党禁、报禁与戒严，这才结束了蒋家王朝的威权统治。正是在此以后，“五权宪法”、“五权分立”才真正在台湾的政治实践中受到全面检验与不断修正。

无论西方与东方，特别是在东方，民主政治在任何国家的成长、完善，都必然要经过一条漫长、复杂、曲折而艰苦的道路。中国长期处在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之下，从来没有什么议会政治的传统。过去认为这是一个优点，其实这只是有利于“枪杆子里出政权”，政权的更替只能通过武装斗争，别无其他良策。现今，国家已经富强，并且逐步走上民主与法治的轨道，我们应该更加尊重前贤追求民主法治的真诚努力，从他们留下的经验教训中吸取智慧，走出政治制度改革的瓶颈，建设更为完善的中国先进政治文明。

第三是民生主义，这是孙中山最具前瞻性的思想遗产，也是当时最为曲高和寡的政治主张，但在百年之后却成为中国与世界面临的最为紧要的严重问题。孙中山师法亨利·乔治与约翰·穆勒，同时又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以及均田、公仓等方案中受到启发，提出“平均地权”以谋防止资本主义贫富两极分化的弊害。孙中山自信“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过去曾被讥评为徒托空言，其实他和他的后继者在这方面还是做过多方面的探索与讨论，积累了颇为丰富的经验教训。“民生”一词，从经济而言，涵盖发展与分配两个方面，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欧美强矣，其民实困”。20世纪初始，中国资本主义还处于极为幼弱时期，1905年提倡“节制资本”诚然是“睹其祸害于未萌”，但现今对于中国而言则早已是严酷的现实。我们虽然标榜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并未能置身于资本主义“祸害”之外，而双轨制经济并存衍生的权钱交易，更使这种“祸害”愈演愈烈。因此，最近几年，政学各界及媒体、网络苦心焦虑，“民生”一词遂成出现频率最高的话语之一。

孙中山及其后继者设计的多种具体方案，已成明日黄花，很难解决当前社会深层转型的复杂问题，但“一手抓土地流转（平均地权），一手抓投资调控（节制资本）”的思路仍然可以对我们有所启

发。孙中山是农民的儿子，他对贫苦民众有本能的同情；他自己又在海外生活时间甚久，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理解最深。这样的领导者，郑重提出的政治设计必定有其现实根据，更有丰富的思维蕴涵，我们理应加以珍惜，作为当前排难解纷的借鉴。

最后还有孙中山晚年对世界主义，特别是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考，经过百年世界风云变幻的映照，在全球化浪潮已经席卷世界各地的今天，仍然可以发人深省。

孙中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临终仍不忘呼唤：“和平，奋斗，救中国。”他又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从革命一开始就谋求国际合作，而且晚年还更为热忱地呼吁建立一个和平、公道、合理的世界新秩序。他为人题字，书写极多的就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他应该是近代中国最高层政治领袖中堪称“世界公民”的第一人。

晚年的孙中山，不再简单地以东方、西方或者肤色差别划分世界，而是把世界区分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两大阵营。他呼吁全世界“受屈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而所谓“受屈人民”，不限于被压迫民族，也包括压迫民族中的“受屈人民”，以及虽已强大然而真诚支持世界各国“受屈人民”的苏联人民。他甚至天真地把“苏维埃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等同起来，劝说日本“联苏以为与国”，共同支援亚洲乃至全世界“受屈人民”的反帝斗争。这可以认为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又一次升华。

孙中山以“恢复中华”作为自己革命生涯的发端，但是从来没有把民族主义的范围局限于中华，更没有以此作为终极目标。他认为民族主义乃是世界主义的基础，因为被压迫民族只有首先恢复民族的自由平等，然后“才配得上讲世界主义”。他期望以苏联人民作为欧洲世界主义的基础，以中国人民作为亚洲世界主义的基础，然后扩而大之，从而实现整个人类的世界主义。

百年以来的世界，风云变幻，日新月异。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与后冷战的国际格局演变，与孙中山的理想相去甚远。但是他的总体思路，特别是有关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关系的深沉思考，并非纯然是美好的空想，仍然有许多值得重视的现实依据。在全球化潮流席卷整个世界，人类已经进入网络化信息时代的今天，正确处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极为复杂而又必

须回答的重要问题。当前某些政论家正在构思的所谓“全球地方关系 (global-local relationships)”或“全球地方化 (glocalization)”，与孙中山的思路正相呼应，似乎一脉相承。

举一可以反三。中国现代的历史叙事，党派成见影响甚深，意识形态束缚尤多，所以很难求得客观、公正、深切的理解。必须以更为超越的心态、广博的胸怀，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并真正置于世界之中，作百年以上长时段的宏观考察与分析，才可以谈得上史学的创新。思想的解放，对中国、对世界，于学术、于现实都大有裨益。我认为这是对辛亥百年最好的纪念。

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在学校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隆重推出了“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其中包括学术研究系列和人物文集系列，总计多达 30 余种著作。这套文库的出版，称得上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学术文化工程。尽管由严昌洪教授担任主编的十卷本《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等新书未收入文库，而是由其他出版社出版，但这套文库仍然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多年以来华中师范大学在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从 1978 年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成立辛亥革命史研究室，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由原国家教委批准建立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再到 2000 年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而改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数十年来虽历经人事更替与诸多困难，但辛亥革命史始终是我们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其间不断有新成果问世，研究所一代又一代学人为之付出的心血，从现今出版的这套文库更不难窥见一斑。

当然，这套文库所收录的著作，无论是学术研究系列还是人物文集系列，都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不尽完善之处，希望能够得到海内外学者的批评与指正。

前 言

100年前爆发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震惊中外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虽然就时间而言，这场革命运动距今已一个世纪之久，但却始终令全世界的华人无法淡忘。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举行各种纪念活动，辛亥革命都未曾因时间的流逝而遭受冷遇，并且还在很大程度上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关于辛亥革命对中国的影响，多年来海内外学者曾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探讨，而且大都给予了正面的肯定。但近些年来，在海内外也听到了一些不同的评价，认为辛亥革命以暴力方式强行中断了清末新政的进程，使中国丧失了一次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机遇，对中国现代化发展不仅未产生正面的影响，相反还带来了诸多负面效应，有的论著甚至将军阀混战局面的出现也归咎于辛亥革命。

不过，迄至目前这些“新观点”并未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并遭到一些学者的反驳。对这些“新观点”尽管没有形成争论，但却已经促使近代史学界对一些相关的问题进行更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这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尤其是深化和明确对辛亥革命历史作用的认识，客观上倒是起了一定的激发作用。

本书并不是完全针对近年来海内外出现的这些“新观点”撰写的，而主要是希望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报刊舆论、教育、城市变革、民间社会和农村社会等若干方面，更加深入地考察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发展变迁所产生的影响。因此，全书的特点之一，是在体例上按专题研究进行排列，而不是平铺直叙和面面俱到地撰写辛亥革命史。这种体例当然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但也具有论述比

较深入的长处。另外，本书主要是着力探讨辛亥革命在各方面所产生的影响，自然也对人们如何看待上述近年来出现的“新观点”有所帮助。

本书各章的执笔人是：前言、第三章、第七章：朱英；第一章：刘伟；第二章：王杰（张冰、赵艳芝撰写了本章第三节、第五节的初稿，陈志雄、张俊尤、刘海彬参与技术处理工作）；第四章：马勇；第五章：赵建国；第六章：余子侠；第八章：何一民（李瀛涛、杨宏校、周兰兰等人撰写了本章的部分初稿）；第九章：林济。

本书系多名学者共同撰写，无法进行反复推敲，各方面的疏漏和缺陷在所难免，诚恳希望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朱 英

2011年2月

目 录

| | |
|----------------------------|-------|
| 前 言 | (1) |
| 第一章 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 | (1) |
| 一、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与辛亥革命 | (2) |
| 二、辛亥革命与新制度 | (17) |
| 三、辛亥革命与旧社会 | (26) |
| 四、辛亥革命的历史遗产 | (35) |
| 第二章 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发展 | (46) |
| 一、民主政治体制的开新 | (49) |
| 二、专制政治之还魂 | (66) |
| 三、各种救国思潮的涨落 | (83) |
| 四、民主革命旗帜之再举 | (103) |
| 五、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产生 | (139) |
| 第三章 辛亥革命后的经济政策与经济发展 | (158) |
| 一、南京临时政府的经济政策与影响 | (158) |
| 二、民国元年工商会议的召开 | (172) |
| 三、民初北京政府的主要经济政策 | (190) |
| 四、民初北京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响 | (203) |
| 第四章 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文化 | (213) |
| 一、孙中山革命思想的起源 | (214) |

| | |
|---|-------|
| 二、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思想论战····· | (231) |
| 三、民国初年的思想危机：传统主义的崛起····· | (247) |
| 四、帝制复辟的理论与实践····· | (265) |
| 第五章 辛亥革命时期以《申报》为代表的报刊舆论政治倾向的变化 ····· | (271) |
| 一、《申报》政治倾向演变的轨迹····· | (272) |
| 二、《申报》政治倾向演变的原因与影响····· | (298) |
| 三、对《申报》政治倾向演变的历史透视····· | (319) |
| 第六章 辛亥革命与近代教育变迁 ····· | (334) |
| 一、辛亥革命前教育的递进发展····· | (334) |
| 二、辛亥革命后的立新变革与复古····· | (372) |
| 三、辛亥革命前后教育发展之比较····· | (406) |
| 第七章 辛亥革命与商界商会的发展 ····· | (424) |
| 一、辛亥革命后商界的发展变化····· | (424) |
| 二、辛亥革命后商会的扩展····· | (436) |
| 三、辛亥革命后以商会为代表的民间社会制衡能力的增强····· | (442) |
| 第八章 辛亥革命与近代城市变革 ····· | (460) |
| 一、工商业发展与新兴城市的崛起····· | (460) |
| 二、辛亥革命与城市发展····· | (477) |
| 三、社会风俗变革与城市人的现代化····· | (491) |
| 第九章 辛亥革命与近代农村社会变迁 ····· | (516) |
| 一、传统农村社会的城镇与村落····· | (516) |
| 二、晚清团练兴起与农村社会变化····· | (529) |
| 三、辛亥革命前夜的城镇与村落····· | (540) |
| 四、辛亥革命时的农村社会····· | (558) |
| 五、近代以城镇为中心的农村社会····· | (571) |
| 后 记 ····· | (589) |

第一章 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

目前，学术界常用“社会转型”一词来概括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范型的转变。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近代以前的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社会；自19世纪后半期以后，随着新机器工业的产生与发展，中国逐步显露出向现代社会即工业社会发展范型转化的征兆。在这一过程中，新结构开始诞生和壮大，旧结构趋于没落和瓦解，社会呈现出新旧结构交替的景象。在新旧结构交替的过程中，原有的与旧结构相适应的旧体制也会发生变化，逐步为与新结构相适应的新体制所取代。所以，社会转型既是社会变迁过程中新旧结构的转换与过渡，也是新旧体制的更替和交接过程。就每一种社会变迁范型而言，其内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结构和体制间都存在着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关系。所以，社会转型也就是社会的整体性变迁过程。

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经历过这种社会变迁范型的转变。自工业革命以来，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也是许多国家社会转型的共同特征。然而，1840年以后由于中国多次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又制约着中国的社会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又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封建国家，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积淀，这两方面决定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和艰难性。探讨辛亥革命与社会转型的关系，或者说从辛亥革命看社会转型，又从社会转型看辛亥革命，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这种复杂性和艰难性，并进而把握近代中国社会变迁，都是极其有益的。

一、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与辛亥革命

(一) 近代社会经济转型和城市化是辛亥革命发生的第一步阶梯

“革命”是中国古老的词汇。《易传》中就有“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的语句。“革命”实指符合天意、道义的改朝换代现象。然而在解释革命的原因时，古代政治哲学则将其归之于“天命”和“民心”。在古代政治哲学中，与革命论相表里的还有正统论。在封建社会，正统是专门用以说明王朝的合法性及其历史地位的^①。以正统论作为革命论的补充，正是为了进一步说明符合正统的革命的合理性。

历史在不断地前进、发展。进入 20 世纪，中国接连发生了两次革命，1911 年的辛亥革命和 1949 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两次革命早已超出了改朝换代的历史循环，具有了新的意义。然而仔细观察，却又可发现在有关这两次革命的认识方面，特别是关于革命原因的分析 and 评价方面，人们似乎仍没有完全摆脱古代“革命”观的基本思路，尽管“天命”论已抛弃了。就以辛亥革命而论，人们常常是从清王朝的腐败和人心所向的角度去揭示其发生的原因，论证其取代清王朝的历史必然性和正义性、合法性。就是民主革命的领导人物也没有脱离这一基本的思维框架。

被誉为旧民主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于 1911 年武昌起义后草拟的《通告全国书》中称：“我辈中华之国民也，愤满政府之残戾，用是特起雄师与孽种战，务祈推翻恶劣之政府，驱除暴戾，而建立共和国。”^②在与伦敦《滨海杂志》记者的谈话中，他历数清政府 260 年来的种种虐政，以证明革命党人反清革命的正义性。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吴玉章曾说：“在辛亥革命以前的十年间，革命形势已经相当高涨了。从人民方面来说，已经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从统治者方面来说，也已经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

^① 刘泽华：《中国传统政策哲学与社会整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第 327、350 页。

^② 《通告全国书》，见《孙中山全集》第 1 卷，中华书局，1981 年，第 545 页。

还进一步指出：“人民不能照旧生活下去，就倾向于革命。”^①

清朝腐败，以革命而扫荡之，这确实是当时的实际情况，两位革命家都是站在当时现实的角度，揭示出它的深刻意义，作为进一步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手段，是必要的。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史学工作者却把它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只是顺着这些革命家的阐述，去解释辛亥革命的原因，去评价辛亥革命的意义，却未免太局限了。从“清王朝不能照旧统治”、“人民不能照旧生活”的角度解释，仅仅反映了辛亥革命发生的一般性特征，却无法说明辛亥革命所展现的各个独特面貌。辛亥革命是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任何社会运动的发生，都是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辛亥革命又是一场突发事件，任何历史突发事件都需要一定的机遇和突破口。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使我们深感以往视角的不足，深感放宽视界，从整体历史角度把握辛亥革命的必要。而把社会结构与体制变迁放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中作整体的考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

从这一视角看，正是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为辛亥革命的酝酿与发生提供了基础，也为辛亥革命提供了超越以往改朝换代革命的必需的条件。

作为社会结构的变迁，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后发生的。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首先直接冲击了中国传统政治结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打破了皇权、国家主权、中央政府权力三位一体的权力结构，分割了中国的司法权、制定关税权，还分割了清政府对财政收入的支配权和对本国领土的军事自保权。列强特权击破了皇权的权威体系，成为皇权之外的第二权力渠道。

在中国传统政治结构因受列强特权打击而开始变化松动之时，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一统天下也开始被打破。在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入侵和出口贸易需求的刺激下，传统的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开始瓦解，并加速了部分农产品的商品化过程。与此同时，在通商口岸城市，首先出现了专门执行流通资本职能并与产业资本联系的新型商业，传统商业出现了向资本主义商业转化的迹象。再进一步，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又陆续出现了资本主义的机器工业。

^① 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0页。

纵观 19 世纪后半期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这一外部影响虽然对中国社会变化起了触动的作用，但社会变迁的过程，却主要是在内部因素的作用下进行的。19 世纪 40—60 年代中国的传统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虽然同时受到外力的冲击，但由于中国内部回应方式不同，所以变化很不一致。在政治结构方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清朝统治者对所存在的危机缺乏足够的警觉，他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仍是如何保持住天朝的尊严。正是从这一心理出发，他们除了为应付对外交涉设置了一个总理衙门以外，很难主动对政治结构作出大的调整。在经济结构方面，由于中国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不能不受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影响，所以其变化表现为两种趋向：一种是自发的趋向，如耕与织的分离，部分农产品商品化，资本主义商业出现等；另一种是自上而下的，即在一部分地方督抚倡导下兴起的洋务自强运动，使中国出现了一批军事和民用机器工业，并进一步带动了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投资近代企业。所以，19 世纪后半期，中国社会转型主要表现为经济结构的转换。

这一时期经济结构转换对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到 1894 年，中国大约有了 216 个机器矿厂和小轮公司，其中官办军事企业 19 个，资本 5000 万余两；官办或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民用企业 27 个，资本 2964 万两；私人资本企业 170 个，资本 879 万两；总共大约有 9 万至 10 万名工人^①。当然，与传统结构相比较，这些新因素微乎其微，但它却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发生的原动力。然而经济因素或者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不直接导向革命，它还必须通过一定的中介，才能为革命的发生提供阶梯。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在整个社会中各个结构之间都是彼此适应、相互依存的，所以，当某一结构发生变化时，必然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其他结构。伴随着 19 世纪后半期经济结构的缓慢变化，中国社会其他结构也或多或少地发生松动，其中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或者说经济结构变化的伴随物，是城市化的启动和城市的变化，从而为辛亥革命的发生提供了第一步阶梯。

^①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340、379、452 页。